



苏联农业百科全书选译

集体农庄建設

財政經濟出版社

苏联農業百科全書选譯

集 体 農 庄 建 設

卡拉瓦也夫著
黃 潔 譯

財政經濟出版社
1956年·北京

集 体 農 庄 建 設

*

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总布胡同 7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60 号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粒 1/32 · 2 印張 · 42,000 字

1956 年 9 月第 1 版

1956 年 9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500 定价: (7) 0.19 元

统一书号: 17005.7 56.8. 京型

集 体 農 庄 建 設

馬克思列寧主義創始人論小農經濟的社会主义改造
苏联集体農庄制度的歷史性勝利，極其鮮明地証實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关于在資本主义条件下和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農業的發展道路，以及关于小農經濟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与方法这一理論的正确性。

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小農所处的困苦和絕望的境地完全証實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這一預言：

“……小農，正如任何过了时的生產方式的殘余一样，在不可抑止地走向滅亡。他是未來的無產者。”（“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二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25頁。）

資本主义生產方式的矛盾使農民备受压榨，使千百万昨天还是“独立”的小農变成赤貧并淪为資本的奴隸。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認為：只有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并把小農經濟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大生產，才能拯救小農免受貧困和破產。

“只有打倒資本家，農民才能翻身。只有反对資本主义的工人政府，才会消除小農在經濟上的貧窮和社会地位越來越低的現象。”（“馬恩全集”第8卷，第76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取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应当給小生產者以支援，但这种支援不是采取巩固他們私有制的形式，而是帮助他們过渡到合作的經營形式。馬克思主義創始

人預見到在解決這一任務時必定會遇到許多困難，因而向無產階級提出一個要求：只有通過示範的力量，而絕不是採取強迫的辦法，才能把小農經濟轉向社會大生產的軌道。

恩格斯寫道：

“……我們預見到小農不可避免的滅亡，但我們決不應該以自己的干涉去加速這種滅亡。……同樣顯而易見，當我們掌握國家政權的時候，我們根本不能設想我們會像我們不得不對大土地所有者採取辦法那樣，去用強力剝奪小農（不論有無報償，都是一樣）。我們對於小農的任務，首先是要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但不是使用強力手段，而是依靠示範和為這個目的提供社會幫助的辦法。當然，到那時候，我們將有充分的資料給小農證明他們現在本來就應該明了的那些好处。”（“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二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34頁。）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這些論點，在列寧的合作化計劃和斯大林同志的集體化理論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列寧斯大林關於小農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學說，後來在斯大林同志的領導下，在蘇聯光輝地實現了。

在列寧的合作化計劃中，極其詳盡地探討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有可能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指出了這種改造在無產階級解決其歷史任務中的決定意義。列寧寫道：“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無產階級專政，則是消滅階級的一個決定性的條件，同时也是一條唯一的道路。但是，“為了消滅階級……就要消滅工農間的區別，把全體的人都變成工作者。”（“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40頁。）列寧指出：對農民的這個任務，只有“把全部社會經濟加以組織上的改造，從個體的、單獨的小

商品經濟過渡到公共的大經濟，才能解決。”（“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40頁。）如果不解決這一任務，那末就不能消滅資本主義，因為“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大批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92頁。）

把小農生產徹底改造為社會主義大生產的這一任務，既然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才能解決，那末，列寧關於合作化計劃的中心問題，當然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本身的问题，就是如何全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了（參閱列寧：合作化計劃）。列寧教導說，在我國確立無產階級專政並準備必要條件對農業中的小農生產進行根本的社會主義改造，只有在無產階級和基本農民群眾之間確立了正確關係、即在他們之間確立了牢固聯盟的關係並保證工人階級在該聯盟中的領導作用的條件下才能實現。第八次黨代表大會根據列寧的提議宣布了對中農這一唯一正確的方針，黨堅持不渝地貫徹了這一方針。

實現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一個決定性條件，就是恢復國內現有的工業並建立新型的社會主義大工業。這種工業，正如列寧所說的，它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基礎，是無產階級的經濟基礎。這種恢復工作和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大工業的工作，在第一階段上只有在恢復了受戰爭和動亂破壞的貧、中農經濟的條件下才能得到保證，因為貧、中農經濟是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原料和糧食基地。而這一點也正是鞏固工人階級和基本農民群眾聯盟的一個極重要條件。這個任務並且成為黨在1921年根據列寧提議所宣布的新經濟政策的基礎。黨同時還按照列寧的指示與農村中的資本

主義分子、與資本主義分子對廣大農民群眾影響的增長趨勢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這一鬥爭不僅通過爭取中農和加強貧農陣地等辦法，而且還採取了一系列反對富農、反對商品生產條件下、特別是新經濟政策初期農村資本主義因素不可避免的增長趨勢的措施。列寧擬定了與富農鬥爭的幾個主要階段，即在第一階段上限制富農分子的剝削並逐漸從經濟上加以排擠，然後隨着社會主義大工業的鞏固并在農業中的社會主義生產形式也取得勝利的條件下最後剝奪富農。

列寧這一政策保證了整個國民經濟的高漲，保證了社會主義工業的恢復和發展。至於把小農經濟引上社會主義大生產軌道上去的根本任務，列寧在這方面所提出的堅決要求，就是使農民合作化和在農村中建立新的物質技術基礎——採用機器技術並實行農業生產的電氣化。

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合作社不可避免地要變成資本主義企業，而且是“資本主義的集體機構”。列寧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合作社是農民由小的、落后的個體經濟向集體的社會主義大生產過渡的最近便和最容易接受的道路。列寧在其英明地制訂出來的合作化計劃中，極其尖銳地提出了大力支援各種形式的合作社的問題，必須保證最廣大的農民群眾踴躍參加合作社，以便從而真正創造出進一步過渡到集體主義的軌道、即過渡到合作化高級形式去的一切必要條件。

這一過渡必然是長期的。列寧曾經不止一次地指出了這一點。早在1918年12月在第一次全俄土地部、貧農委員會和公社的代表大會上，列寧即已說過：

“由個體小農經濟向土地共耕制過渡的這種關係最深

刻的生活基礎的千百萬人們生活中的偉大變革，只有通過長期的勞動才能實現，只有必然性迫使人們改變自己生活時才能實現。”（“列寧全集”第28卷第318頁。）

這一過渡只有在農村勞動者自己特別是中農意識到有此必要時才能實現。

列寧揭露了農民的兩面性：一方面是勞動者，一方面又是私有者。列寧教導說：“這種分別就是社會主義的全部實質所在。”（“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41頁。）農民勞動者和無產階級的利益是一致的。先進的無產階級應當支持、發揮和鞏固農民這一方面並從而把他們完全爭取到自己這方面來。列寧談到中農時說：“當然，中農是搖擺不定的，他們只有在看到可靠的、事實上能夠說明這種過渡是必要的例子時，才會同意向社會主義過渡。”（“列寧全集”第28卷第322頁。）

共產黨為實現列寧的合作化計劃而鬥爭 斯大林同志研究出了集體化的理論，這是黨在農村中團結貧中農、反對富農、組織和支持一切社會主義創舉方面所進行的巨大工作。這些工作加強了勞動農民對過渡到新的、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形式的必要性的認識。黨在列寧逝世後在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領導下所實現的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就是列寧的合作化計劃的光輝實現。

列寧逝世後，列寧的合作化計劃遭到了托洛茨基右派賣國賊反革命匪幫的瘋狂攻擊。這些反對列寧主義的萬惡的敵人、黨和蘇維埃人民的敵人，千方百計地企圖阻撓偉大的列寧關於在我國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思想的實現。他們瘋狂地反對黨所採取的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堅定方針，如果沒有這個堅定方針，蘇聯社會主義就

不可能取得勝利。

托洛茨基分子一开始就狂热地反对党的总路綫，反对列寧的合作化計劃的实行。他們以好像存在着“無法克服的冲突”、世界革命還沒有勝利以及社会主义無產階級和社会主义農民之間有“矛盾”等等的理由，完全否定用我國工農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吸收基本農民群众参加農村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的可能性。

資本主义的右派复辟者——布哈林分子开始还不敢公开反对党的路綫，但他們却偷偷地在贩运着富農和平長入社会主义这一套反革命的“理論”，而且还提出了“發財吧”这一反动口号。这个与列寧論階級斗争、和聯合中農以及对小農進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學說絕不相容的富農口号，就成为右傾分子一切主張的中心“富農和平長入社会主义”这一反列寧主义的理論的一个組成部分。

敌人破坏苏联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的一切企圖全部遭到破產，因为捍衛在我國建成社会主义这一列寧思想的是列寧事業的偉大繼承者斯大林同志。

党在偉大的斯大林的領導下坚决奉行了列寧所拟定的在我國勝利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并和農民一起實現着这个任务。

斯大林同志教導說：

“重要的是要和農民一起、必須和農民一起而且必須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來建設社会主义，因为工人階級的領導乃是建設能循着社会主义道路前進的基本保証。”（“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23—124頁。）

斯大林同志揭露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对派胡說什么農民反对工人階級和農民按其地位來說是与社会主义

思想背道而馳的這一企圖的反革命性質。斯大林同志依據蘇維埃的實際情況，指出了在與蘇維埃政權的敵人、與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的革命鬥爭過程中，我國工人階級不僅從貧農方面，而且也從中農方面找到了直接的支持，而不是反對。

斯大林同志指出：當接着提出吸引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這一問題的時候，情形也是一樣。為什麼？因為農民雖然按其地位來說是非社會主義性質的，但是“他們應當走上而且一定會走上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因為除了和無產階級結合，除了和社會主義工業結合，除了通過農民普遍合作化把農民經濟引上社會主義發展的總軌道以外，沒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足以使農民免於貧困和破產的道路。”（“斯大林全集”第8卷，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9頁。）

斯大林同志在揭露布哈林“富農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理論的反列寧主義的實質時說道：“布哈林的富農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是離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的……”（“斯大林全集”第12卷，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1頁。）實際上什麼“和平長入”是根本不可能的。“歷史上還沒有過垂死的階級自動退出舞台的事情。歷史上還沒有過垂死的資產階級不試圖用盡全部殘余的力量來衛護自己的生存的事情。”（“斯大林全集”第12卷，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5頁。）

斯大林同志在與黨的敵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分子的鬥爭中，不僅保衛了列寧關於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里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學說的純潔性，不僅保衛了列寧的合作化計劃的純潔性，而且在其天才著作中還進一步發展了這一偉大學說，保證了這一學說的光輝實現。

斯大林同志依據列寧的合作化計劃，研究了農業集體

化的理論并加以实施，对農業集体化理論的研究及其实現，保証了苏联集体農庄制度的勝利，这是斯大林同志的一个極偉大的功績。斯大林在这方面的新貢獻就是：

(一)从各方面闡明了農村中社会主义經濟的集体農庄形式問題；

(二)指出了現階段上集体農庄的基本和主要環節是農業劳动組合，因为農業劳动組合是農民最易了解的一种最正确的形式，它能把集体農民的个人利益与他們的公共利益配合起來，使集体農民的个人利益適应于公共利益；

(三)論証了从限制和排擠富農的政策过渡到在全盤集体化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的必要；

(四)揭示了農業机器站的意义，說它是按社会主义原則改造農業并由社会主义國家帮助農業和農民的据点。(“斯大林傳略”，莫斯科1950年中文版第103—104頁。)

國家社会主义工業化的勝利和在農村中开展集体農庄运动的方針 党按照列寧、斯大林的指示所采取的國家社会主义工工業化的方針一开始就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社会主义工工业以空前的速度發展着。可是分散、落后的小農生產占优势的農業却落后于这个速度。虽然農業整个說來也超过了战前水平，但它的主要部門——谷物業只占战前水平的91%，而商品部分只占战前進入市場的谷物的三分之一强。貧、中農經濟大多数还是半自給經濟，只能供应少量的商品產品。在这个基礎上國內粮食就產生了困难，而且这种困难因握有多余粮食的富農上層分子的拒售而日益加深。在谷物業所处的这种狀況下，苏联的紅軍和城市居民势必陷于經常挨餓的境地。

斯大林同志極深刻地揭露了造成这种狀況的根本原

因。他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農業落后于國家工業的發展速度，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國農業技術過分落后和農村文化水平很低，另一方面特別是由于我國分散的農業生產不像我們國有化的聯合經營的大工業那样拥有种种优点。斯大林同志說道：

“農業生產不是國有化的，不是聯合經營的，而是散漫和分成許多小塊的。它并不是按照計劃經營而是絕大部分暫時还受小生產自發勢力支配的。它还没有按集体化路線聯合成为規模巨大的經濟，因而它还是一种使富農分子便于進行剝削的場所。这些情況就使散漫的農業不能像我們國有化工業那样拥有种种巨大优势，即联合一致按計劃原則經營的大規模生產所具有的那些巨大优势。”（斯大林：“在联共(布)第 15 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1953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32 頁。）

斯大林同志依据列寧关于必須把小農經濟轉变为巨大的集体化的農業經濟这一指示，深刻地总结了發展苏維埃農村所積累的經驗，根据國內因社会主义工業化的勝利、合作化运动的發展以及農村階級斗争的情況而產生的新形勢，果斷地提出了必須立刻使農業轉到新的社会主义的發展道路——即大規模集体農庄建設的道路上去的問題。只有这条道路才是使農業擺脫落后狀況的唯一正确的出路，才是提高農業產品率和商品產量以及根本改善廣大的貧、中農群众生活狀況的手段。也只有这条道路才能保証苏联循着社会主义完全勝利的道路不斷向前發展。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說道：

“出路就在于用公共耕种制做基礎來把零散的小農庄聯合为大農庄，用新的更高的技術做基礎來实行集体耕种

制。

出路就在于循序漸進，然而一貫到底地，不是用强迫方法，而是用表彰和說服方法，把小的和極小的農莊聯合成為大的農莊，以公共的共耕式的集體的耕種制做基礎，同時采用農業機器和拖拉機，采用增加農業強度的科學方法。

別的出路是沒有的。”（斯大林：同上書，第33頁。）

斯大林同志說道，如果不把分散的農戶聯合起來，如果不把它們轉到土地共耕制的軌道上來，那末就無法切實向前推進農業的集約經營和机械化，就無法使我國農業在發展速度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國家。

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根據斯大林同志的建議，作出了大力開展農業集体化運動的決議。大會提出了把個體的小農經濟聯合並改造成為集體大經濟的任務作為黨在農村中的基本任務。

在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以後，蘇維埃農村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即在嚴格遵守列寧所提出的農民參加集體農莊的自願原則的基礎上堅決使農業轉到集體化的社會主義大生產的軌道上去的時期。這一工作是以列寧、斯大林的黨的政策，農業集体化和消滅農村資本主義的政策的完全勝利而結束的。

黨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後發動的向資本主義分子的堅決進攻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激起了敵人瘋狂的憤恨。他們看出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勝利和在農村中開展集體農莊建設會使他們企圖在我國復活資本主義的希望完全破產，因而就加緊進行破壞、暗害的活動。在這個期間曾破獲了許多暗藏的反革命組織。

在此以前一直掩飾着自己觀點的資本主義右派復辟者（布哈林分子），这时也公开地反对党的路綫。他們主張保留富農經濟，要求降低社会主义工業化的發展速度，收束國營農場和集体農庄建設的規模，予私人商業以充分自由并放棄國家在貿易方面的調節作用。右派分子企圖歪曲列寧的合作化計劃，企圖閹割它的革命內容，以便破坏這一計劃的實現。無耻的資本主義復辟者反对对富農采取非常措施和向富農征稅。这种立場所意味着的不是別的东西，而是与馬克思、列寧主义完全断絕关系，而是支持農業中的資本主义，而是否定無產階級在農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領導作用。右派分子为了替他們的反党、反革命立場進行辯护，于是臆造了一套反列寧主义的反动理論，如：階級斗争“熄滅”論、蘇維埃經濟部門“平衡”論、社会主义建設事業“自流”論以及小農經濟“穩固”論。所有这些反列寧主义的所謂“理論”，其目的就是想維护富農經濟的陣地，想武裝城鄉資本主义分子以达到資本主义复辟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取得对階級敌人的决定性的勝利，只有揭露敌人的这些理論并通過進一步發展馬列主义理論的办法來粉碎它們。这一个任务也已被斯大林同志出色地完成了。

斯大林同志在被称为創造性的馬克思主义典型范例的“論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問題”这一歷史性著作中，給徹头徹尾虛偽的、反列寧主义的布哈林“理論”以歼滅性的打击。斯大林同志在这个著作中根据对社会主义建設實踐深刻的、科学的总结，拟定了过渡时期經濟的中心問題，特別是苏联農業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設問題。

斯大林同志在揭露右派投降分子企圖歪曲作为列寧关于社会主义在苏联完全有可能獲得勝利这一學說的最重要

部分之一的合作化計劃并企圖把合作社和集体農庄对立起來的陰謀時指出，列寧的合作化計劃包括所有一切農業合作形式，由初級形式（供銷合作形式）起一直到高級形式（生產的集体農庄形式）止。因此，斯大林同志說道：“實行列寧的合作化計劃，就是把農民從銷售合作社和供應合作社提高到生產合作社，提高到所謂集体農庄的合作社。”（“斯大林全集”第11卷，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8頁。）“把集体農庄同合作社對立起來，就是侮辱列寧主義並證明自己愚昧無知。”（同上書，第12卷，第117頁。）

斯大林同志對敵人理論的揭露并加以粉碎，這是在一切戰線上展開社會主義進攻和在蘇聯取得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條件。

在馬克思主義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發表的那篇歷史性演說中，斯大林同志極深刻地肯定了集体農庄也是社會主義經濟形式的問題。在這次會議上，反對我們黨的托洛茨基分子企圖污蔑集体農庄，硬說它是與社會主義經濟毫無關係的一般的私人資本主義企業。斯大林同志指出，這樣地估計集体農庄是完全不對的，是與列寧主義背道而馳的。斯大林同志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形態是取決於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社會關係，是取決於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這一著名原理。他指出，集体農庄是社會主義經濟。在集体農庄中沒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生產資料不是私有，而是公有，而土地則屬於國家。

斯大林同志說：

“當然，在集体農庄里是有矛盾的。當然，在集体農庄里是有人主義殘余甚至富農思想殘余的，這些殘余還沒有消失，但是過一個時候，隨著集体農庄的鞏固，隨著集体農

庄的机械化，这些残余必定会消失。但是整个說來，把矛盾和缺点都包括在內，集体農庄作为一种經濟因素基本上是農村發展的新道路，是和富農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相反的農村的社会主义發展道路，这难道可以否認嗎？在我國条件下，集体農庄（我說的是集体農庄，而不是冒牌的集体農庄）是在同資本主义分子進行殊死搏斗中發展起來的農村社会主义建設的基地和策源地，这难道可以否認嗎？”（“斯大林全集”第12卷，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43頁。）

托洛茨基分子这些帝國主义資產階級代理人，他們否認集体農庄的社会主义性質，說集体農庄內發生了和集体農庄外的同样的階級斗争，甚至比集体農庄以外更殘酷。斯大林同志揭露了敌人关于集体農庄中階級斗争的这些胡說，斯大林同志說道：

“集体農庄外的，集体農庄成立以前的階級斗争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說，同占有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并用这些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盤剥貧農的富農進行斗争。这个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

而集体農庄基礎上的階級斗争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这就是說，富農已經被擊潰并被剝奪了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其次，这就是說，貧農和中農已經在基本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基礎上聯合为集体農庄。最后，这就是說，这是集体農庄庄員之間的斗争，他們中間一部分人還沒有擺脫个人主义殘余和富農思想殘余，企圖利用集体農庄內的某些不平等現象圖利營私，而另一部分人想把这些殘余和不平等現象从集体農庄中剷除掉。”（“斯大林全集”第12卷，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45頁。）

斯大林同志說，如果以為集体農庄庄員已变成了社会

主義者，那就錯誤了。其實，還要做很多工作來改造集體農民，消除他們的個人主義心理，使他們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集體農莊機械化進行得越快，即集體農莊對最新的技術裝備採用得越快，我們也就会越早達到這個目的。

“集體農莊的偉大意義，正在於它是農業中採用機器和拖拉機的主要基地，是用社會主義精神去改造農民、改造農民心理的主要基地。”（同上書，第146頁。）

偉大的斯大林的這些指示，成了黨在建設集體農莊和機器拖拉機站方面所進行的一切活動的依據。

苏联在農村發展方面的偉大轉變和集體農莊制度的勝利 集體化速度的加快，就是黨按照斯大林同志和十五次黨代表大會關於在農村中開展集體農莊建設和堅決進攻富農的指示而採取了各種措施的結果。1929年下半年，貧農和中農群眾都堅決地參加了集體農莊。農民由於都結合在得到國家大力支援的集體農莊里，就擺脫了富農的奴役。

集體農莊的數目由1928年7月1日的33,300個增加到1929年秋天的67,400個，而其中集體化了的農戶則由1928年的40萬戶增加到200萬戶。1929年集體農莊數量的迅速增加特別是集體化農戶的增加，很清楚地說明了這一年是廣大貧農和中農群眾向集體農莊根本轉變的一年。這就是黨所取得的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一個巨大勝利。

斯大林同志寫道：

“這裡指的是我國農業發展中的根本轉變：從細小的落後的個體經濟進到巨大的先進的集體農業，進到共耕制，進到機器拖拉機站，進到以新技術為基礎的勞動組合即集體農莊，進到用數百台拖拉機和聯合收割機裝備起來的巨大